

心甘情愿写巨变

——《花灯调》创作谈

□刘庆邦

10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脱贫攻坚、山乡巨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不是石碑,而是口碑;不是建在地面上,而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上。作为中国的作家,我们有责任为这座丰碑“添砖加瓦”。作家的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活儿、良心活儿。我们想写什么,是良心使然,心甘情愿。不是别人要我们写,而是我们按捺不住激情,自己要写。不写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时代,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良心。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花灯调》,是我在2023年年初完成的。我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立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期间我感染过“新冠”,发烧、咳嗽,嗓子疼了好几天,照样写作。春节放假期间,我跟往年一样,也是早上4点起床,在写作中度过。我常常写得泪眼模糊,看不清稿纸上的字迹,不得不抽出一张面巾纸,擦一擦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将近30万字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感动自己的过程。我愿意用三个“千年”来概括脱贫攻坚和实现小康,即“千年德政”、“千年梦想”和“一步千年”。

先说千年德政。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工业和采矿业,无法积累起雄厚的资本。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财政支出,还有边防所需的军费,主要靠农业赋税、靠剥夺农民的口粮,靠向土地索取。中国人不全是土里刨食,还从土里刨银子、刨刀枪。衣衫褴褛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差不多都被官家收走了,祖祖辈辈过的都是忍饥挨饿的日子。遇上天灾、匪患和兵荒马乱,逃难和饿死的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悲惨状况,不仅史料多有记载,一些诗歌里也有生动描述。白居易《观刈麦》里写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李绅《悯农》里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无疑是广大种地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普天下,是农民通过种庄稼、打粮食养活人类,人类才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才是全人类最原始的、真正的衣食父母。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是“种田的吃米糠,晒盐的喝淡汤,纺织娘没衣裳,编席的睡光床,当爹娘的卖儿郎”。难道他们天生就该受穷吗?天生就该受剥削吗?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历史的沉痛呢?这种情况在新中国被改变了,到了2006年,农民终于不用再交农业税。几年之后,国家又出台了新政策,不仅农民种田收入全部属于自己,国家还按亩数给种田农民发放补贴,种的田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多。不出还入,这是世世代代的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然而,别急着欢呼,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

呢。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集中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全民奔小康的历史性工程。经过8年的持续奋斗,到2020年,全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贫困县统统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上也鲜有先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脱贫攻坚,创造了全世界、全人类的奇迹。此景只应天上有,如今终于到人间。我坚信,我国脱贫攻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必将载入华夏民族的史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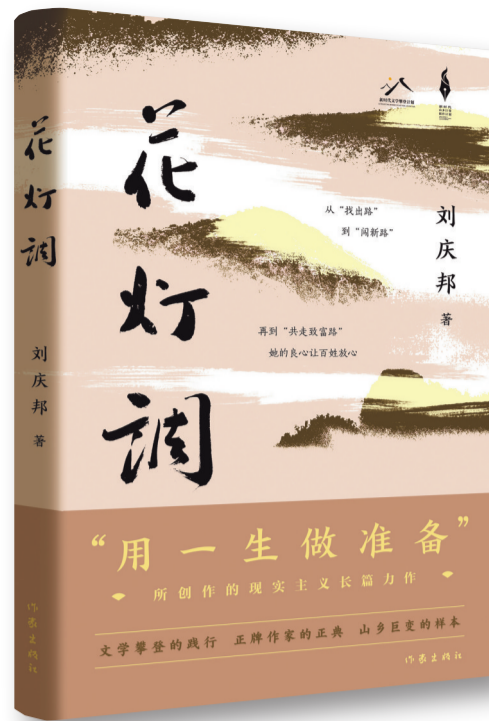
再说千年梦想。几千年来,中国人有很多梦想,其中一个最起码的梦想,是天天都能吃饱饭,一年四季不饿肚子。可是能吃饱饭的时候很少,往往是一年只有半年粮,几乎每年春夏之交都青黄不接。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人——1960年我9岁,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生产队的大食堂断炊,面临解散,一口吃的东西都难以寻觅。我抬头望天,想吃云彩,云彩不能吃。我低头看地,想吃土粒,土粒不能吃。我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子、细腿,上学连跑操都跑不动。我爷爷饿得双腮浮肿,肿得闪着黄铜一样的光亮,一摞一个坑。爷爷一坐地上,就无力站起,需要我和二姐两个人使劲拉,才能把他拉起来。我父亲饿病交加,在当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去世了。小弟弟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我吃过从河里捞出来的杂草,杂草上附着有一些小蛤蚧,一嚼咯吱咯吱响。我吃过榆树皮,母亲把榆树皮在筛子里碾碎,下到锅里煮成粘液给我们喝。粘液连成一坨,我喝了一口,还没尝出什么味,就秃噜滑进肚子里去了。我吃过柿树皮,柿树皮外面一层干裂的树皮根本没法吃,只能吃里面紧贴树干的一层湿皮。我把那层湿皮剥下一块,放在火上烤,等把湿皮烤干,就放进嘴里使劲嚼。烤干的柿树皮又苦又涩,十分难吃,但我还是把它嚼碎,自欺欺地咽了下去。以前我没说过,我还吃过糊坷垃——食堂里烧煤需掺一些土,土里会混进一些砂子,经过火烧,坚硬的砂子儿被烧熟了,变成了糊坷垃。每当食堂里往外倒炉渣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抢上去,从里面扒糊坷垃吃。每扒到一粒糊坷垃,我们就像得到一颗香炒豆一样,高兴得眉开眼笑。

尽管每天饿得肚子前墙贴后墙,我和大姐、二姐有时还在一起谈理想,也就是谈梦想。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家里盛馍的筐子里能经常有馍,我想吃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拿一个。我的大姐、二姐都认为我的理想太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不大。她们的理由是:你要是随便吃,把筐里的馍都吃完,别人吃什么呢!

我从小就听说过两句话:饭舍给饥人,话说给知人。意思是说,把饭给饥饿的人吃,人家才会心生感激;把话说给知理的人听,听话的人才听得明白。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贫困经历,是想说明,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是想说明,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得并不容易;是想说明,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越是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还是想说明,心怀沉痛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天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第三步是一步千年。从脱贫攻坚到实现小康,这伟大的一步,等于一下子跨越了几千年。还是让我用事实说话,从身边的事说起。我老家所在的县是贫困县,所在的村是贫困村。还在农村生活的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子家,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虽说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出来参加了工作,但我几乎每年都回老家,和农村老家还保持着骨肉般的紧密联系,贫穷好像还在拖着我的一条腿。1975年夏季,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变成一片泽国。我蹬着齐腰深的水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逃水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村子里已渺无人烟,仿佛回到远古的鱼龙时代。大水退下去后,村里人再也盖不起房子,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泥草棚子里。在吃的方面,因生产队分的粮食少,家家粮食都不够吃,有时只能靠吃糠菜或讨饭度日。在穿衣方面,几乎人人穿的都是破烂衣服,或是打补丁的衣服。更有甚者,有的人家打发闺女出嫁时,竟连一条新裤子都给闺女做不起,只能向别人暂借一条裤子给闺女穿。改革开放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之后,当农民积累起一定财富,农村的面貌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块地,但天已不是原来的天,地已不是原来的地。天上彩霞满天,大地换了新颜。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高的盖到了四层。我们村的名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居高的向往,代表着一个梦想。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梦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穿衣早已不成问题,不管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摆单,棉摆棉。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平日连黑馍都不够吃,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馍。现如今呢,每天吃的都是白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乡亲们感叹:我哩个乖乖,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嘛!在脱贫攻坚中,我大姐家、二姐家和二姐的大儿子



《花灯调》,刘庆邦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家,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最基本的事实。如果我们不是预设偏见,道听途说,而是心怀良知,尊重现实,那么这些现实非常值得我们书写。

我们村的变化是这样,全国的变化也是如此。2022年端午节之后,我到贵州遵义下面的一个偏远山村定点深入生活,所获得的素材更加典型。这个村是贵州的深度贫困村之一,截止到2015年,全村近五千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才876元。山里往山外不通公路,连简易的砂石路都没有,只有一些乱石嶙峋的山间羊肠小道。整个山村几乎长期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被人们称为“高山孤岛”,村里的不少老人和孩子连汽车都没见过。村民养肥一头大猪,需请8个青壮男人分两班轮流抬,才能抬到山外卖掉。他们刀耕火种种出的蔬菜和水果,吃不不完的因无处可卖,只能眼看着白白烂掉。村民要盖房,一些从山外购买的建筑材料,还得使用马匹驮运,常常是房子还没盖成,先把马累死了。除了不通路,村里还不通水,不通网络,不通高压电,所有生产、生活和生存方式,几乎还处在原始状态。村里的小伙子们也外出打工,打工期间找到对象,对象生下孩子后,实在不能忍受山村的贫困,就扔下孩子跑掉了,一去不返。这种情况最能证明山村的贫困程度,让人痛心疾首。

2016年春天,市检察院选派一位女检察员,到这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进行脱贫攻坚。在女书记的带领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这个村从交通、水利、电力、通讯,到教育、卫生、文化等多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全面、现代化、高质量巨大发展变化,堪称全国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到2019年,全村的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12000

多元。不少人家拆掉旧房,盖成别墅式的新楼房。过春节期间,在全村院坝停放的小轿车就有一百多辆。“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村里的小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对象。村民们把这些变化编成花灯调的唱词,广泛传唱。

总的来说,我国的脱贫攻坚和全民脱贫,的确称得上是一个一步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哲学和文学方面的重要意义。脱贫攻坚奔小康,让全国各族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具有彻底的社会人道主义性质。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宗旨之一,其精神一直被我们的文学创作大力弘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不可能对脱贫攻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同样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受益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安全、和谐、富足的盛世,让我们发出小小的作家应该发出的真实声音吧。

我最初为这部小说起的题目是《泪为谁流》。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事业付出了太多辛劳、心血和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流的眼泪就不说了。小说写完后,我再看看自己的小说时,仍禁不住流泪。我现在写小说,还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写,完成后,由妻子帮着录入电子版。小说一共写了28章,每交给妻子一章,我都要先看一遍,看看有没有错别字需要改正。可以说,不管看哪一章,都有让我泪湿眼眶的情节和细节。妻子录入的办法,是对着手机语音转汉字录入,录完一段,再转到容量较大的笔记本电脑里。我很喜欢听妻子读我的小说,每听到她开始读,我就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也不干别的任何事情,悄悄在一边闭目听妻子读。虽然闭着眼睛,但听着听着,仍挡不住有眼泪涌出,让我能感觉到眼泪的咸和眼泪的辣。我想这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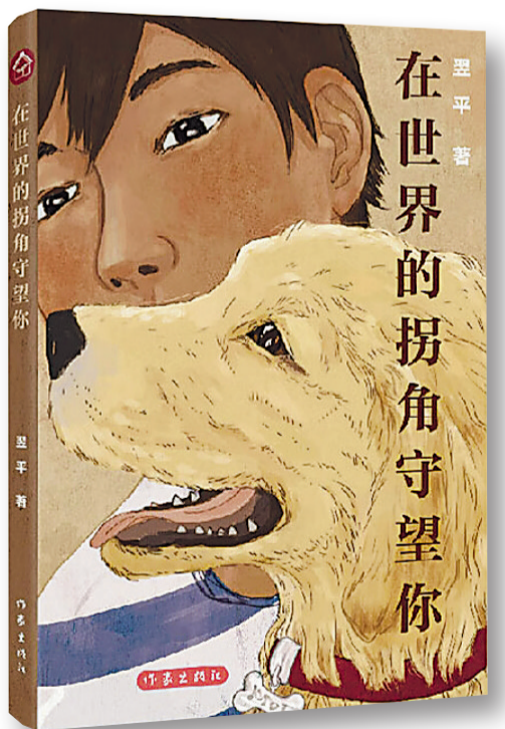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把小说更名为《花灯调》,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更有色彩,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们就会唱起花灯调,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调是民间小调,有地方色彩,更能表达民众心声。

每当一部新书面世,媒体记者总是会问,作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写这部书的?酝酿了多长时间?我想,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创作访谈

□翌平 韩歌



《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翌平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4月

而让读者感受到一点生命的意义、感觉到生命力量的作品,这才是不错的想法。

韩歌:颁奖词评价这是一部“结构独特”的小说,书中有六个人物、六只猛犬、六个故事,但它们并不是六部独立的短篇小说,而是故事彼此联系。您对这个小说的结构是怎样考虑的?

翌平: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实际上是可以带来美和阅读魅力的,这类构思在国内的儿童文学中虽然不多见,但会有越来越多写作者进行尝试。这个小说的结构就像一副完整的象棋,车马炮不仅是独立的棋子,它们还构成一个整体。六个故事是相互说明的,从不同的叙事角度切入,这样一件事就有了前因后果,每个人物讲述的都是同一件事,但又不会不太一样,这就让小读者在阅读过后会上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对故事的想法,这样的阅读更像是一场游戏。我不太喜欢平铺直叙的讲故事的方式,那样很没劲。如果能调动小读者与书互动,阅读就会变得有趣很多。

韩歌:您之前在作家出版社还出版过一部少年小说《野天鹅》,这也是一部多角色、多声部的小说。两部作品在写法上有什么相同和不

同?创作《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时,遇到了什么新的挑战?

翌平:《野天鹅》是部音乐儿童小说,题材我更熟悉。关于狗的行为矫正的故事,我并不太熟悉,在写作中得到了几位养狗和训狗的朋友帮忙,在创作过程中也花费了更多的心思。相比起《野天鹅》,这部作品让我更坚决地完成了在小说结构上的构思,还有就是去努力体会生活,写出狗的本来模样,而不是拟人化的狗世界。

韩歌:您的小说还有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音乐要素常常贯穿其中,并且您似乎更擅长写古典音乐。例如《野天鹅》写的完全是音乐大院的孩子们的故事;《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的六个故事之一就是叫“贝多的欢乐颂”。您与音乐有什么不解之缘?音乐对您的小说而言具有什么意义?

翌平:我认为在儿童文学中,音乐可以是小说灵魂的一种表达。一个好的小说一定要有一种小说氛围,就如同古典音乐里的基调一样,好的小说也要讲究节奏、轻重、缓急和音色。每个章节里故事发展的快慢、冲突的进退和强弱,不同狗的形象和性格,都与上面的音乐要求相契合。古典音乐的最后一章一般都是用来总结以及尽情抒发前面汇集的情感,这与作品中的“送别”一章是一致的。如果儿童文学有乐趣,那么读者的感觉会很丰富多样,小说也就不会只局限于讲述一串好人好事了。

韩歌:书中的角色很多,但每一个人物、每一只猛犬都有鲜明的特色。我们在阅读角色较多的小说时,会特别关注他们的名字,您在为《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的主人公“主夫公”起名时,有没有什么小心机、小彩蛋?

翌平:布朗曾经是我的狗,我在书里用了它的名字。我记得那时双手经常举起它不挣气的黄耳朵,给它唱《阿童木》的主题歌,布朗就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抗拒嘴脸。它是土狗,棕色的,所以用英文单词的译音来做名字。我没有给“黄毛”单独起个名字,有点遗憾,因为我在生活中见到的那条大狗鬃毛太长了,耷来时有点像

人烫过头发,就本能地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其他狗狗的名字都是创作过程中灵感激发出来的。

韩歌:您小说的主人公大多集中于少年这个成长阶段,这是一个迷人而充满可能性的年龄段。您小说中的少年,常常有一种坚韧顽强、野蛮生长的气质,给读者以力量。文学名著中也有许多迷人的少年形象,在您的阅读经验中,有没有哪些少年的形象给您留下深刻印象?从您个人生活和创作的角度,为什么更偏爱写少年的故事?

翌平:儿童文学的受众,可以分为幼儿、儿童、少年三类。国内儿童文学的受众主要是小学生,所以过去儿童文学会更侧重于小学低年级的小读者。实际上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的孩子已经是少年,他们完全有阅读世界名著的能力,对于他们的作品不应该低龄化。一个全面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能写出针对这三个年龄段的文学作品来。少年小说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在国内,少年小说还是个比较混杂的概念,很多作品还是用给小孩写故事的方式写给少年看。少年作为开始形成独立人格的群体,与儿童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他们开始独立思考,不再盲从大人,有勇气与冲动自己面对世界、解决问题,这与儿童需要扮演大人的乖小孩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好的少年小说一定是把孩子当成主人去写,写他们面对困难时所迸发出的生命活力。国际上的少年小说很多,角色个性鲜明,比如《哈利·波特》里的主人公,《坟场之书》中的诺伯蒂,他们都体现出少年的个性和活力。

韩歌:2019年,您的作品《大山里的孩子》获得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单篇作品奖。时隔四年,这次您以一部长篇获得了同一个大奖的最佳文字奖。近几年您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一直在持续发力,今后是否会将重心放在长篇的写作上?有没有什么新的

写作计划透露?

翌平:很感谢评委专家的认可,时隔四年,算是一种检验和鞭策吧,自己也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一点点进步。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成长周期,不太可能享有连续的鲜花和掌声,重要的是能咬牙坚持住,葆有自我进步的渴望。之后我可能会写一个与动物有关的童话,针对低年级小学生的,应该会轻松一些,争取能写出一个让小孩子兴奋和吃惊的故事。

(提问者系《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责编)



《在世界的拐角守望你》插图